

2017年国内晚清政治史研究述评

邱志红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摘要: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晚清政治史既是中国近代史政治史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同时也是广义清史的重要组成部分。2017年的国内史学界借助清史资料建设“黄金时代”的东风,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从多个视角对晚清制度史、晚清历史事件与人物、晚清中外政治关系史等进行了更为充分、细致和深入的研究。其中,晚清制度史和事件史,仍旧是晚清政治史研究领域的重心。晚清史的整体研究仍在成熟、稳健的学科发展中继续保持旺盛的活力。

关键词:晚清;晚清政治史;晚清制度史;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28X(2018)04-0082-11

DOI:10.16398/j.cnki.jbjieissn1008-228x.2018.04.012

检视2017年度国内晚清政治史研究,最明显的特点是伴随从事件史到制度史的回归,晚清制度史的研究继续受到国内学界的关注和重视,发表了不少有学术价值的论文,内容涉及清末制度改革、科举制和晚清教育制度、晚清财政制度、晚清法律制度等各个议题,极大地推进了晚清制度史的研究。晚清历史事件和人物研究也取得明显进展,一方面研究重心后移,大量论文聚焦在清末最后十年间的历史;另一方面像鸦片战争史、太平天国史等几乎达到所谓“学术高原”的研究领域,在相对沉寂的研究态势中仍然出现不少有亮点的学术论著。此外,在中外政治关系等晚清政治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也发表了不少值得关注的研究成果。

一、晚清制度史研究

在晚清制度史研究领域,清末最后十年间的制度改革长期为学者所关注,研究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督办政务处是清政府在新政期间新设的推行新政事务的重要机构,学界以往的研究多注意讨论督办政务处的章程条文,对其实际运作则

往往语焉不详。赵虎发表3篇相关论文,对督办政务处与清末新政的关系进行系统研究,指出其职能权限伴随政局变动、人事变更和新政进程而不断调适,不同时期呈现不同面向。具体而言,辛丑“两宫”回銮之前,由于特殊的内外政情,督办政务处职能广泛,既需对有关新政折件做最后覆核与审议,又需代行其他有关机构甚至军机处之职权,确为统汇新政之枢纽,且与京内外各部门关系密切;丙午改制后,督办政务处改组为会议政务处,成为朝廷为暂缓组建责任内阁而设立的过渡性机构,在预备立宪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3]李俊领选择清末仿行宪政新形势下礼部新设之机构礼学馆为研究对象,对其设立的来龙去脉及其修订礼仪制度以及介入法律修订事务的具体举措与成效进行探讨和反思,揭示了礼学馆中人复杂的政治理念、文化情怀与制度变革相互纠缠的多重关系,指出礼学馆在礼法制度修订上进行的一些因时制宜的探索和尝试,但是由于清廷内外未能预先建立起改革共识,礼学馆最终也未能完成其试图调适礼治与宪政的改革之任。^[4]彭雪芹对清末外官制改革中巡警道员的选任问题进行了专题研

收稿日期:2018-06-27

作者简介:邱志红(1977—),女,河南郑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晚清政治史、法制史、华侨史研究。E-mail:qiuzh@cass.org.cn

究,认为在巡警道员选任规制形成的过程中,清廷、民政部、督抚等多方博弈,典型地反映了清季官制改革、铨法变迁与政局变动之间的多重互动影响。^[5]赵卫宾通过对清末新政期间新疆警政的建设、整顿以及发展过程的详细梳理,系统揭示了新疆编练巡警军并逐渐走向近代警察体系的职业化之路。^[6]崔志海则聚焦于清末的币制改革,从中美关系以及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视角重新审视1904年美国货币专家精琪(J. W. Jenks)来华及其币制改革方案,认为精琪来华帮助清政府进行币制改革,双方表面都以促进中外贸易和投资相标榜,实则各有所图。而清政府最终拒绝精琪主张导入金汇兑本位制的货币改革方案,不能将其简单归咎于晚清“货币发行地方化”所代表的地方利益的抵制,而是在于该方案没有顾及中国主权和利益,以及其他一些主客观条件。^[7]

对于清季终结的科举制,学界已充分认识到其作为一个综合机制在考试教育、官僚选拔、分层配置、人才流动等方面的丰富内涵。杨念群从晚清士子阅读史的角度出发,通过梳理晚清改革群体妖魔化科举内容及功能的过程,将科举制置于王朝与地方治理的脉络下,对晚清科举制由“改”而“废”的进程及其社会影响重新加以审视,指出科举制在选拔人才方面实际具有人文与经世训练并重的双重职能,科举制的废除,导致传统社会由“学”选“官”路径的终结,士绅社会由此消亡,中国式的“代议”现象也在乡村中消失殆尽。^[8]关晓红则从官僚选拔的层面,对清代科举取士、铨选举官这两种文官选举制度在选举方法、规则、标准等方面的联系与区别,以及从清初及至晚清时期的变化轨迹进行了细致考察与辨析。指出清代铨选多途并进,相互渗透,加之终清一代满汉复职的官制设置,使得科举取士只是汉人选官渠道之一途,科甲出身者对官场的实际影响受限。道咸以降科举改革与铨选制度的变化,反映了晚清社会变革的种种复杂困境,以及学风、官风、民风与世风的密切联系。^[9]此外,孟义昭对清代江南乡试分闱之议的复杂过程以及光绪朝无果而终的原因与影响进行了专门讨论和分析,弥补了科举史研究以往只重视乡试分闱成功之湖广、陕甘研究之不足,

指出有清一代江南分闱之议此起彼伏,根源在于江南分省,但由于安徽、江苏两省自身的城市因素,特别是安庆的地理位置及其城市特点难以获得安徽全省的认同;江南两省官员、士绅群体对于分闱态度不一,甚至互相掣肘,始终未形成命运的共同体;清廷对江南采取防范、压制政策。以上各种因素交织,加之清帝国的大一统体制,致使在知识公平与区域公平发生冲突时,清廷艰难地选择了后者,江南乡试成为清代历史上唯一自始至终两省合闱的乡试。^[10]马子木则重点考察了道光以降翻译科向驻防八旗扩展,最终形成驻防八旗内“文闱与翻译兼行”双轨体制的发展历程。指出翻译科在驻防八旗的开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驻防旗人的仕进空间,但实际上由于铨选制度的弊端,以及翻译科自身制度上的缺陷,驻防士子实际上很难通过翻译科取得理想的官职。^[11]顾建娣具体探讨了晚清旗人书院与清前中期的差异及其原因,认为晚清旗人书院的变化反映了旗人文化的流变和晚清社会的变迁。^[12]

作为晚清制度史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财政制度史研究继续得到研究者的关注,且咸同时期的财政转型成为本年度的研究热点。倪玉平对此一时期的财政转型进行了系统考察,认为咸同时期中国经历了从“国家财政”到“财政国家”的转变,具体到奏销制度层面,咸丰以前的钱粮奏销、京饷协饷基本失效,户部无法有效地掌握全国财政大权;租税结构层面,财政收入的主体由农业税转变为以厘金和海关关税为主的工商税;指导思想方面,清政府也在事实上放弃了“量入为出”的财政理念而步入了“量出为人”的阶段。^[13]廖文辉聚焦咸丰朝的户部银库,对先行研究进行了检讨和补足,指出彭泽益、史志宏等人研究中的核心资料,即同治四年(1865年)三月十三日户部左侍郎皂保奏折所附《咸丰三年至同治三年的银库收支与库存数量清单》所指并非户部银库,而是吉林银库。在详细爬梳户部银库黄册(包括大进、大出,尤其是四柱册)与饷鞘月单等资料的基础上,根据对咸丰朝历年户部银库实银收支数据进行重新统计和分析,廖文辉指出,咸丰朝的户部银库不仅在具体的收支内容、数量、规模方面发

生了重大变化,其在全国财政运作与经费调度中的重要性也大为降低,从之前的全国财政中枢一降而为仅供京师用款的财政,作者认为这种变化反映了内外合力作用下清政府因应财政危机的能力,以及财政运行逐渐脱逸旧轨的变化趋势。^[14]面对太平天国战事带来的财政危机,咸同时期清政府的战时财政模式依次经历了传统户部酌拨制度、咨商拨解制度、就地筹饷和隔省筹饷制度的演变。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藩统率湘军东征围攻安庆,为解军需之困,在湖南长沙设立临时性的战时筹饷机构——东征筹饷局就是隔省筹饷制度的具体实践。王静雅对湖南东征筹饷局的兴废历程做了具体考察和论述,指出东征筹饷局兴废过程中官商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官员之间的交谊与共谋、清廷与外省利益之间的共识与分歧、战区省份之间的博弈与妥协、旧制度与新章程之间的矛盾与张力等等因素互相交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晚清战时财政运作备受牵制的复杂面向。^[15]刘增合立足于晚清长时段的战时财政运作模式,对同光年间左宗棠的西征筹饷问题做了重新探讨,通过再现晚清战时财政运转中环环相扣的关键链条,系统梳理了晚清战时财政制度递嬗之轨迹,指出与咸同时期太平天国战争时期相比,左宗棠西征时期户部酌拨地位明显上升,省际咨商拨解、举借外债以及借拨外省库款夹杂其间,总理衙门与户部共同调控海防与塞防的争款纠葛,致使晚清战时财政供饷模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而旧有协饷制度是否有效运作,东部淮饷与西征军费如何均衡调处,成为同光时代检验清廷治国理政智慧的关键。^[16]盐政是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洪均对咸同年间战时财政体制下湖南盐政从“北川南粤”到粤、川、淮三盐并存的演变做了较为系统的考察,并以盐厘收入为切入点,通过销区争夺中省区与中央、省区与省区之间的博弈分析,认为清廷既欲收拢地方财权,又无力承担以指拨筹措各省开支的责任,导致就地筹饷的战时财政体制继续维持,“外重内轻”的格局未能得到扭转,其根源在于清廷统治者国家治理能力的低下及自身的腐朽。^[17]倪玉平重点考察了同治七年(1868年)底至同治九年(1870年)初两江总督马新贻兼理两

淮盐政期间进行的盐政改革,指出经由马新贻寓票于纲的盐政实践,晚清两法盐政改革重新回到纲法体制,晚清两淮盐政制度至此最终定型。^[18]任智勇则关注道咸时期粤海关的体制演变,从人事、关税政策以及收入、支出情况等四个方面系统探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1843年)至上海小刀会起义(1854年)期间粤海关的关税制度变迁,认为清政府为维护粤海关的主导地位,无论是中枢还是广东方面都有明显的回到原来一口通商制度的意愿,然而外部各局的变动与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加之制度调整过程中对既有制度的过度依赖,使这种努力终成泡影。^[19]

在晚清法制史研究方面,近年来吴佩林对清代四川南部县衙司法档案的研究用力甚勤,成果迭见,本年度的几篇力作,如对清中后期县衙堂审记录“叙供”文书和诉讼实践中“违式”递呈的考察和分析,均是从地方司法文书制作与实践的角度对清代后期地方法律运作方式研究的进一步拓展。作者研究表明,有别于以往一般意义上对清代州县司法程序中口供的理解,州县司法档案中的堂审记录实际上呈现出不同的文种,明代及清初常见的记录口供的形式为“招状”,清中后期演化为“叙供”。四川南部县的叙供多由案件承办房的书吏完成,并非仅出于“刑房”,其书写结构的变化,显示了地方司法责任渐趋明确化、规范化的特征。^[20]此外,基于《南部档案》中“违式”递呈案例的梳理和分析,作者指出,遵用状式是清代县衙维护地方诉讼秩序的一项基本规定,但在诉讼实践中,由于涉讼者受经济、制度改变等因素影响,“违式”呈状的现象时有发生,且成为诉讼者的一种诉讼策略,而地方官府对此类“不遵用状式”递呈的受理,反映了他们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理论观。^[21]张世慧以牙行侵欠客商、京城钱铺关闭及倒账三种案例为中心,对清代商业活动中钱债案如何在全国范围内突破州县自理范畴的过程做了较为系统的探讨和分析,揭示了社会经济秩序的变动对固有法律制度、司法审断及统治秩序的冲击。^[22]邱志红以发生在民国初年之姚荣泽案的审理为历史透视点,重新梳理以陈其美为代表的军政派和以伍廷芳为代表的法制派各自

如何以正义的名义处理该案的来龙去脉,探讨该案作为“中华民国首宗审判”开启近代中国司法独立先声的历史革新意义,同时具体揭示此案背后的另一位关键性人物孙中山的司法思想。^[23]在充分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许同莘档案及日记、唐烜《留庵日钞》稿本等资料的基础上,李欣荣、王雁分别对晚清法律人物许同莘、唐烜进行了个案研究。前者重新挖掘晚清“失语”法政人物许同莘学法、修律之人生轨迹,认为其坚持以西法为主导、新旧并蓄的法学理路,未能适应晚清以降趋新的时代大潮,代表了“过渡时代”中的似旧还新者,并提示学界更多关注其参与清末修律实践的意义。^[24]王雁则关注唐烜在刑部、大理院司官任上的公务活动及生活空间,并以此为切入点探讨晚清变革时期六部司官群体的公务生活及工作状态。^[25]此外,田欢通过对晚清新疆建省后命盗案件法律政策调整与实践的考察,探讨了新疆法律政策自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26]

除上述涉及晚清制度史领域的论著外,王刚的《甲午战争中的督办军务处》、吴佩林的系列论文《清代地方档案中的州县官官衔释读》《清代州县书吏薪金变化及其原因》、李治国的《清代中后期蒙古年班制度的调整与变化》等,均对晚清官制、文书制度、藩部朝觐制度等内容有所讨论。^[27-30]

二、历史事件与人物研究

关于虎门销烟和鸦片战争及相关人物的研究,卢晓瑞对林则徐和王笃在广东禁烟期间围绕“主战”和禁烟举措政见方面的异同,二人友谊缘起及破灭的过程做了详细的考辨。作者认为,道光二十年(1840年)九月林则徐被革职实际上源于以琦善为代表的“主和派”怀柔主张迎合了道光帝的真实想法,王笃卸职离粤前后在“主战”政见上与林氏完全一致,不仅未有议和主张,也未参与议和诸事务;二人的分歧在于对禁烟举措的不同看法,王笃偏向“弛禁”主张,且因依附穆彰阿及其党羽,为明哲保身、推诿责任,方有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八月前后入京述职时向道光帝状告林氏事件发生,此后二人友谊终告决裂。诸多

研究者将王笃作为羁绊林则徐销烟的关键性人物,有失偏颇。^[31]王涛基于中英双方战争亲历者的记载、海军出版物、报刊等资料,对鸦片战争前后英军在中国沿海的水文调查活动及影响做了系统考察和分析,指出正是由于英军的水文调查改变了其对中国沿海的地理认知,影响到战船、火炮、兵力的配置以及战略战术的实施,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原因。^[32]

在太平天国史研究方面,刘晨对天京事变的研究不囿于成说,勇于提出新见,围绕“密议”“逼封”和“密诏”三大疑案,抽丝剥茧,试图勾勒出全新的天京事变真相。作者认为,天京事变前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同时向天京方向移动的原因,最大可能是接受了杨秀清的调令;洪秀全下达的是具有突发性和非正式性的“密函”,所谓“诛杨密诏”其实并不存在;杨秀清被杀的时间被洪秀全人为地前置于1856年9月2日,实际上“东升日”很可能在9月5日;事变前夕,洪秀全下达诛杨明诏,诛杨实践从“同盟密议”“靖难密函”发展到“公开声讨”的阶段,并非过去学界认为的洪氏在事变中一直是暗处操控。天京事变对太平天国的折损尚不能以“盛衰分水岭”来定位。^[33]祁磊注意到咸丰十年(1860年)上海战役进程中太平军首领李秀成和洪仁玕的意见分歧,指出后者从决定东征苏常沪到放弃上海这一态度的转变,成为上海战役失败的关键因素。^[34]庞毅通过讲述太平军长沙之战中善城隍守城成功的故事,揭示出晚清政府、地方官员对待地方神明的复杂态度。^[35]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外和局”的形成,清政府得以全力对付太平军。关于清军与太平军的关系,曾志文对咸同之际总理衙门主持的兵舰外购事件做了专门探讨,指出兵舰外购的最终失败源于总理衙门、地方督抚、各海关以及英方的权力博弈,而总理衙门与湘淮系督抚购舰目的和态度的差异为要因所在。^[36]围绕周立春是否经刘丽川动员加入天地会、周立春与罗汉党的关系、周立春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是否存在“统一的上海小刀会”等问题,周育民著文与戴海斌进行了有益的商榷,既丰富了人们对上海小刀会起义的认识,也深化了太平天国史的研究。^[37]作为基督教在华传

播初期最著名的华人基督徒,梁发1832年撰著的《劝世良言》一书,直接影响了洪秀全与太平天国运动。司徒以英国伦敦会新教传教士案卷中仅存的一部相对完整的《梁发日记言行》(1830年3月至11月)为基础,探讨了梁发的宗教观念。^[38]针对太平天国善后、“同治中兴”的标志性事件——江苏减赋,周健在重建1780—1900年江苏起运交仓漕额大数据的基础上,从事件史、政治史以及财政史的角度,重新进行了探讨,指出督抚司道在该事件中始终发挥主导作用,为重赋压力下的地方官员减负,实为同治减赋的重要动机。^[39]

关于洋务运动及相关人物的研究,学界一般意义上将李鸿章同治九年(1870年)出任直隶总督视为其洋务建设得以长足发展的起点,并进一步将其洋务事业概括为19世纪70年代的创兴时期、80年代的发展时期以及90年代的停滞及破产时期这一“三段论”表述。朱浒从军用工业、民用工业和海防建设三个方面,对19世纪70年代李鸿章的洋务建设活动从之前的高歌猛进到后半期停滞不前甚至部分倒退的剧烈波动及其影响因素做了专门考察,指出光绪初年“丁戊奇荒”引发的财政窘境,使得这一时期的西征军务、洋务建设与赈灾活动围绕清政府的资源分配,呈现复杂的互动与博弈,在朝廷力保西征军务的政治格局下,赈务最终对洋务建设形成了极大的挤压。^[40]汪荣祖对洋务派代表人物郭嵩焘与晚清政局的关系做了探讨和反思,认为郭氏对洋务以及西学的认识,远超同时代同以洋务见称的李鸿章、沈葆楨、丁日昌等人,已经涉及体制改革层面的思考,堪称高瞻远瞩者,但他终未能引领时代,不为主流社会所接受,且遭骂名,其个人境遇与结局亦成为那个悲哀时代的最真实注脚。^[41]

邱涛在仔细考索中日文献史料的基础上,对甲午陆战中学界主流久已“定论”的史实重新做了考察和辨析,认为叶志超、依克唐阿在战争中的怯懦表现,源于清军军火储备实际上的严重不足,而像徐邦道这样得到正面肯定的重要军事将领,实际上并不具备应对近代战争的军事素养和才能。他的研究丰富了人们对甲午战争失败原因的具体认识。^[42]葛业文分析了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失

败的原因,认为最直接和主要的原因来自军事上清政府军事改革不彻底、战争准备不足、战略指导混乱无方、战术战法不当以及军队战斗力低下。^[43]

本年度戊戌变法史与相关人物方面的研究亮点颇为突出,可谓提前吹响了翌年戊戌二甲子周年纪念的号角。马忠文利用总理衙门总办章京顾肇新与其兄顾肇熙的书信资料,对1897年中德胶州湾交涉、1898年春张之洞入枢受阻、翁同龢开缺原因、总署议复康有为《第六书》、政变后张荫桓革职原因及光绪皇帝征医等问题,做了新的研究,纠正了一些讹说,对研究晚清政治史特别是戊戌前后的朝局和政情有很大助益。^[44]在细致爬梳新出版的《徐世昌日记》及未刊荣禄信札等资料基础上,马忠文重新检视戊戌政变后复杂朝局中袁世凯的政治境遇,指出在应对山东危局问题上,袁世凯与毓贤的分歧与纠葛,除政见差异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军机大臣荣禄与刚毅之间的权力斗争。^[45]此外,马忠文对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一册翁同龢“伪札”所依据的原本、仿本问题进行了具体探讨和分析,并对史料利用与文物收藏的密切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46]关于湖南时务学堂的纷争,不同于学界将此视为新旧之争的论断,贾小叶的研究从“康党”“康学”切入,重新揭示时务学堂之争实际存在着—明—暗—两条线索的多元、复杂面相。^[47]此外,贾小叶就《杭州驻防瓜尔佳氏上皇太后书》一文的作者展开深入的史事考辨,认为实为金梁写出的这篇内容酷似“康党”宣传的“忤逆”上书,背后折射的是戊戌乙亥年间清廷与“康党”“新党”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48]本年度贾小叶另外两篇分别围绕《时务报》、刘坤一与戊戌己亥政局关系的考论文章,进一步丰富了关于戊戌年间政局的研究。作者指出,上海《新闻报》代表维新党人发声,在呼吁变法、反对废立问题上的态度始终如一,在戊戌己亥政局中的舆论界产生巨大影响;^[49]而两江总督刘坤一对于维持戊戌政变后的复杂朝局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参与东南互保的事实,则显示出戊戌己亥年间其对清廷的不满。^[50]戴海斌的研究聚焦戊戌至庚子时期日本人在华创办的政论性杂志

《亚东时报》,通过中、日两方面文献的比勘互证,系统考察了唐才常、章太炎、宋恕等人与该报的真实关系。^[51]

就庚子之乱及相关人物研究而言,朱英、唐论对奕劻在庚辛中外议和中的活动和作用做了深入考察和分析,指出奕劻临危受命,在“惩凶”“赔款”等条目上有所争取,尤其是在中俄专约问题上,更是力陈己见。庚辛议和,成为奕劻政治生涯的新起点。^[52]刘强、李文儒系统梳理了庚子后清廷上谕中有关“母子一心”提法的背景与臣工反应,以及慈禧、光绪帝二人为实现“母子一心”政治默契所做的努力,指出在内忧外患的政治背景下实现皇权利益的最大化,是“母子一心”的根本目的。^[53]

清末最后十年汇聚了一系列性质迥异的重大政治历史事件,因此长期为学界所关注,本年度依旧成绩斐然。庚子事变后,辛丑乡试开科问题成为晚清朝野关注的热点之一。韩策从庚子西狩、东南互保的权力格局中系统探讨张百熙等朝臣与刘坤一、张之洞等东南督抚就乡试展期问题的明争暗斗,以及士绅舆论的反应。作者认为此次论争既反映了庚子乱后当局协调稳定与变革的两难处境,又显示了新政伊始主张渐改与急改的不同趋向,同时说明清廷决策受到东南督抚严重限制,刘坤一、张之洞坚持乡试展期的举动实为东南互保的延续。^[54]张海荣以1902年慈禧太后为醇亲王载沣指婚荣禄之女瓜尔佳氏为切入点,对载沣娶妻背后的政治联姻做了深入的考察和分析,认为载沣娶妻原聘并非荣禄之女,慈禧太后和荣禄对于两家的联姻,也并非一开始就抱有乐观其成的态度。载沣婚姻的变故丛生,既是“戊戌政变”和“庚子事变”的共同产物,更是清末后党专权的产物。通过“指婚”这种略带温情的政治手段,慈禧太后不但举重若轻地化解了甲午战争以来帝后之间的长期对立局面,巩固和改善了统治基础,也有效避免了异日“戊戌政变”旧案重提,确保了自己与荣禄的身后之名,同时还为未来清朝的皇嗣继替指明了方向。^[55]彭剑对张謇在1904年间为推动清廷预备立宪所做的诸多努力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认为张謇主要在三方面影响了清廷的

决策:(1)其所印制的《日本宪法》使慈禧对宪法产生好的观感和印象;(2)对袁世凯的影响;(3)促成清廷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56]赵虎对1905年清政府颁布《会议政务章程》的背景、目的,以及朝野的讨论、反应做了具体考察,认为该章程的出台,是预备立宪前夕清政府尝试沟通中西政体而在体制内进行的一次制度调整,但该章程出台后,不仅未能满足外界预期,而且遭到来自体制内的批评,在新旧两方均不讨好,最终流于形式,未能实现原有意图。^[57]1906年清政府选派张荫棠为查办藏事大臣,参劾前驻藏大臣有泰等官员,并力倡西藏新政。此为近代西藏政治史与晚清边政史研究中的重要事件。康欣平分析了张荫棠得以堪此重任的原因:(1)清廷对派往西藏的大员选拔思路已经转换,即选择具备一定外交才能与经验的人,张荫棠具备这一条件;(2)张荫棠在印度参与《中英新订藏印条约》谈判期间,对如何治理西藏向清外务部发表见解,他的这些对时势把握颇为到位的筹藏观,对他后来的任命非常有利;(3)唐绍仪的推荐。^[58]李学通依据文献与影像史料,对1906年彰德秋操的指挥机关、参演部队、军演经过、观操嘉宾情况,以及秋操影像进行了补充说明和细致考辨。指出此次秋操并没有审判处或评判处这种名称的机构,也没有参谋处,更没有徐世昌负责参谋处之事,也未见徐氏本人参加此次秋操的文献或影像记录,蒋百里也未出现在观操人员名单中。^[59]1907年7月6日安徽巡警总局会办、光复会成员徐锡麟利用巡警学堂毕业典礼之机,突然袭击参加典礼的安徽巡抚恩铭,发动“安庆起义”,又称“丁未皖案”。安东强、姜帆对丁未皖案在推动清末政局进程中发挥的作用加以探析,指出丁未皖案虽然只是一突发性事件,但对之后丁未政潮的走向,清末资政院的设立,谘议局的筹办,乃至长江防务的重新调整,都产生重要影响,显示了清政府、革命党与地方督抚等其他政治势力的相互角力与博弈。^[60]1909年1月2日袁世凯被清廷罢免是清末重大政治事件,在已有丰硕研究成果基础上,马勇、朱文亮从不同角度对此问题做了进一步深入研究。马勇认为袁世凯遭到罢免,主要原因在于他患有足疾,以及与他派遣

唐绍仪推进中美关系抵制日本的外交战略有关联,并非阴谋论,“回籍养病”期间,袁世凯并不是被禁锢,他一方面安心养病,操持实业,另一方面与朝野各界保持着必要的联系,这也为他后来的再度出山埋下了伏笔。^[61]朱文亮则认为除了外交上的原因外,载沣、隆裕有着同样的驱袁动机,才使罢免袁世凯成为可能。^[62]桑兵对袁世凯的《请速定大计折》做了详细考辨,揭示了袁世凯与清廷、拥清势力之间围绕清帝退位问题的博弈。^[63]此外,桑兵的系列论文厘清了辛亥前后对“汉奸”问题的认识。^[64]关于辛亥革命与清末政局的关系,李细珠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对清末权力结构的变动做了进一步阐释和深入论证,揭示了清末“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对民初政治走向的重要影响。^[65]甲午战后十余年间,清政府始终以重建海军为念。关于清末海军重建,李学峰认为载沣摄政后,才真正落实重建海军的决心,并在其支持下,切实为推动海军兴复做出努力,并取得一定的成绩;^[66]马平安则认为清政府在重建海军方面并没有达到加强海防的效果,不可过高估计。^[67]

三、晚清中外政治关系研究

从全球史的视野研究晚清以降的中外关系,探讨中国从清代“宗藩关系”到近代“外交关系”的演变,是近年来晚清中外政治关系领域重要的研究趋势。本年度这一研究趋势进一步加强。

郭卫东对晚清对外关系中中央和地方外交并存的二元化现象以及地方外交从广州外交到天津外交,进而到东南外交三个阶段的发展过程做了较为系统的考察和论述。指出晚清地方外交是传统时代向近代过渡的产物,其发展演变过程反映了从东方朝贡关系到中西贸易关系,再到国家条约关系的演变,显示了国人认知从“夷务”到“洋务”再到“外务”的三段式进阶,表现了从广州贸易体制到口岸通商体制,最终到中央外交体制的转型。^[68]

晚清中英、中日、中法关系的研究,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重心。中英关系方面,张建斌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端方档案,对1902年中英双方围绕长沙开埠过程中城内设立关栈、厘金征收

与治外法权等问题反复交涉的过程进行了专门研究,揭示晚清修订新约的大背景下中英双方的观点与矛盾。^[69]赵欣利用英国原始档案和报刊资料,对“门户开放政策”在英国的缘起、出台、实施、变革及影响等内容做了重新梳理和解析,指出该政策最早是由英国提出并推行,后来转手于美国,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对华的主要外交政策。^[70]

中日关系方面,戴东阳对日本学者高桥作卫的高升号事件研究进行系统的学术史梳理,指出高桥的研究有着深厚的官方背景,其研究目的是为日本浪速舰行为正名。学界对其核心观点开战责任说及事件过程已有辩驳和新的研究,但在对两位英国国际法学者的论说、日本政府的处置、英国政府的态度等评价上,仍存在高桥影响的痕迹。^[71]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借口“保护”朝鲜侨民,挑起“间岛问题”。李花子对“间岛”地理概念的形成与日本的关系进行了重点考察。指出“间岛”地理名称是近代朝鲜人向图们江以北地区移民、开垦的产物。1907年日本利用朝鲜人向这一地区渗透时借用了“间岛”概念,它是日本准备行使特权的势力范围。日本统监府派出所界定的“间岛”假定区域,不但包括海兰河、布尔哈通河及嘎呀河流域(后来的延吉、和龙、汪清县),还包括二道松花江流域(后来的安图县)。由于吉林边务公署的牵制和斗争,日本外务省在签订《间岛协约》时不得不调整其范围,特别是将二道松花江流域排除出“间岛”范围。“间岛”地理范围的最终确定,揭示了日本利用朝鲜垦民向图们江以北地区渗透扩张的过程。^[72]

中法关系方面,《中法会议简明条款》是中法战争过程中双方试图取得妥协的一个和约。由于双方谈判过程中的细节问题,双方最终兵戎相见,中法战争因此重启。张振鹄对影响中法战争由和转战的关键性文件“福禄诺节略”进行了史实考辨,指出1884年5月17日李、福会谈后,李鸿章并未将福禄诺提交的这份法国执行《中法会议简明条款》的路线图报告清政府,北黎冲突后又刻意制造“节略”中关于清政府撤军日期等内容在李、福会谈时即由福禄诺涂抹的假象,并蒙蔽英报

记者,使其加以报道宣扬。正是由于李氏隐瞒了该节略的真相,导致战争再起。^[73]1898年的上海第二次四明公所案,是上海地方史、中法关系史和晚清中外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葛夫平对该事件发生的起因、交涉经过及影响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论述,认为清政府在该案交涉过程中,利用“地方外交”和“以夷制夷”策略,虽然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为总理衙门减压的目的,抵制了法方的一些侵略要求,使得法国政府最终放弃浦东和南向的扩界图谋,但其作用终究有限,反而使清政府的外交显得进退失据,直接导致上海法租界的扩大。^[74]

中国与周边国家宗藩关系的终结,一直是晚清中外政治关系史研究的重要议题。朝鲜不仅是清朝宗藩体系下最重要的藩属国,也是最后一个终结宗藩关系的藩属国。甲午战争宗藩体制解体前的中朝关系是本年度的研究热点。张礼恒对甲午战争前中国与朝鲜的关系以及清政府对朝政策进行了系列研究。他从东亚儒教社会整体转型的宏观视野出发,对光绪七年(1881年)清朝驻日使领与朝鲜“朝士视察团”在日期间基于宗藩体制的特殊规制开展的交流活动做了具体考察,指出,双方围绕国际大势、中朝两国的困境与出路所做的讨论,以及对待日本明治维新的全方位评判,都带有明显的中国印记,展现了中朝两国在全球化运动中的艰难抉择。^[75]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张礼恒进一步探讨了李鸿章对待朝鲜的“不沾不脱”交往原则,认为甲午战争前,清政府的对朝政策是清晰和一贯的,具体体现为李鸿章在1882年提出的“不沾不脱”原则。该原则是对清政府此前解析中朝宗藩关系模糊、含混的修补,是李鸿章在列强环伺形势下对宗藩体制的一种灵活性新解,主旨仍然是为了维护宗藩体制的权威性。^[76]“朴定阳事件”是清代中朝关系的重要转折点,尤淑君从中国、朝鲜、美国、日本等多方关系中对该事件进行重新审视,认为朴定阳出使美国之事,正是清政府检验宗藩关系是否被欧美各国所接受,也是朝鲜向国际社会宣称自主的绝佳机会。但由于中国、朝鲜及美国对于“自主之国”一语的不同理解,加之朝鲜内部的党派斗争与改革思想,使得中

朝两国的争端趋向表面化,也让朝鲜决心引入日本势力,从而埋下了甲午战争的隐患。^[77]

晚清中俄关系方面的研究也有进一步拓展,陈开科在充分利用中、俄文献档案以及晚清报刊资料的基础上,对1891年俄国皇太子尼古拉的旅华事件做了系统论述和分析后指出,此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俄国对华政策以及晚清中俄茶叶贸易的发展。^[78]

晚清中葡关系是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本年度也取得一定进展。张志勇论述了19世纪60年代中葡通商通航条约谈判过程,并注意到英人赫德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指出赫德所提在澳门设关收税与收取澳门租金的建议成为总理衙门压迫葡萄牙公使放弃不合理要求与之进行讨价还价的重要条件。而赫德站在清政府立场反对按照原议换约,以及提出购买澳门的计划,导致中葡换约最终失败。^[79]

此外,王宏斌对中国外侨政策从设立“蕃坊”到“租界”的演变过程做了颇有学术价值的考察和论述,进而审视鸦片战争后中国丧失治外法权的历史渊源。^[80]徐春峰、屈春海对清政府设立驻巴拿马总领事馆的缘由、过程以及总领事欧阳庚调查侨民等活动做了专门研究,指出清政府出于外交对等的原则和意识,在巴拿马于1903年宣布独立、1907年提出在华设立驻华总领事府的同时,已经有在巴拿马设立总领事馆的允诺,直至1910年为进一步保护巴拿马华工才正式设立驻巴总领事馆,作者认为驻巴总领事馆的设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外交近代化的进程。^[81]

四、结 论

笔者大致从三个专题对2017年度晚清政治史学科的研究状况进行了简要梳理和介绍。就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而言,共计84篇,除文中提及的1本专著外,《清光绪帝死因鉴证》、韩策的《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马平安的《慈禧与晚清六十年》^[82-84]等,亦是2017年度晚清政治史研究领域颇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笔者目力所及的这88篇(部)研究成果中,晚清制度史32篇,历史事件与人物研究42篇,中外政治关系14篇。可见

制度史和事件史,仍旧是晚清政治史研究领域的重心。

纵向比较来看,2017年度晚清政治史研究取得的成绩亦值得肯定。从数量观之,2014年度学科综述重点介绍研究成果68篇,2015年度32篇,2016年度63篇,^[85-87]2017年发表的研究成果数量为近4年来之冠。且2017年亦没有相关“历史周年纪念”活动的推出,满族史和满汉关系研究的热点在2016年凸显后,本年度并不突出。虽然由于不同综述撰稿者关注点的差异,仅从数量并不能完全反映晚清政治史研究的特点和趋势,但亦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晚清政治史研究作为比较成熟的独立学科,尽管和民国史研究、抗日战争史研究等目前学界的显学相比有“寂寥”“衰颓”之象,实际上这种“寂寥”“衰颓”恰恰是该学科成熟、稳健发展的重要表现。2017年,国内晚清史学界推出的这80余部(篇)优秀研究成果,已从一个角度表明,该领域的研究继续保持着旺盛的活力。相信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和方法的理论指导下,借助清史资料建设“黄金时代”^[88]的东风,晚清政治史研究,仍大有可为。

参考文献:

- [1] 赵虎. 政务处与辛丑回銮前的新政举措[J]. 清史研究, 2017(1):66-76.
- [2] 赵虎. 清末督办政务处与各方关系述论[J]. 近代史学刊, 2017(1):76-98.
- [3] 赵虎. 仿行内阁:清末会议政务处述论[J]. 西北大学学报, 2017(3):166-172.
- [4] 李俊领. 礼治与宪政:清末礼学馆的设立及其时局因应[J]. 近代史研究, 2017(3):28-45.
- [5] 彭雪芹. 内简与外补之争:清季巡警道员的选任[J]. 广东社会科学, 2017(6):135-144.
- [6] 赵卫宾. 清末新政期间新疆警政的创建与发展[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17(1):110-117.
- [7] 崔志海. 精琪访华与清末币制改革[J]. 历史研究, 2017(6):92-108.
- [8] 杨念群. 痛打“时文鬼”——科举废止百年后的省思[J]. 清史研究, 2017(1):1-32.
- [9] 关晓红. 清代取士选官辨异[J]. 学术研究, 2017(11):111-121.
- [10] 孟义昭. 清代江南乡试分闱动议考论[J]. 史林, 2017(3):59-66.
- [11] 马子木. 翻译科与清代驻防八旗的仕进[J]. 史学月刊, 2017(10):29-40.
- [12] 顾建娣. 晚清的旗人书院[J]. 吉林师范大学学报, 2017(4):32-37.
- [13] 倪玉平. 从国家财政到财政国家——清朝咸同年间的财政与社会[M].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7.
- [14] 廖文辉. 咸丰时期户部银库实银收支问题再研究[J]. 近代史研究, 2017(1):139-156.
- [15] 王静雅. 清代咸同年间湖南东征局兴废考析[J]. 近代史研究, 2017(4):153-159.
- [16] 刘增合. 左宗棠西征筹餉与清廷战时财政调控[J]. 近代史研究, 2017(2):84-99.
- [17] 洪均. 财政变局、省区博弈与晚清国家治理能力——以咸同年间湖南盐政为中心[J]. 江汉论坛, 2017(11):105-111.
- [18] 倪玉平. 马新贻与两淮盐政改革[J]. 扬州大学学报, 2017(4):82-87.
- [19] 任智勇. 从榷税到夷税:1843—1854年粤海关体制[J]. 历史研究, 2017(4):62-78.
- [20] 吴佩林. 清代中后期州县衙门“叙供”的文书制作——以《南部档案》为中心[J]. 历史研究, 2017(5):68-88.
- [21] 吴佩林, 吴东. 清代州县司法中的“遵用状式”研究[J]. 苏州大学学报, 2017(3):46-55.
- [22] 张世慧. 走出“细故”:清代商业活动中的钱债案与法律调整[J]. 近代史研究, 2017(2):69-83.
- [23] 邱志红. 姚荣泽案再认识——兼论孙中山的司法思想[C]//赵国辉. 交涉中的“西法东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7:263-282.
- [24] 李欣荣. 清季许同莘的学法、修律与法学理路[J]. 中山大学学报, 2017(3):93-102.
- [25] 王雁. 晚清六部司官公务生活的时与空——以刑部司官唐烜为中心[J]. 清史研究, 2017(3):82-93.
- [26] 田欢. 晚清新疆法律政策的调整与实践[J]. 广东社会科学, 2017(4):111-120.
- [27] 王刚. 甲午战争中的督办军务处[J]. 军事历史研究, 2017(2):55-67.
- [28] 吴佩林, 曹婷. 清代地方档案中的州县官官衔释读[J]. 安徽史学, 2017(5):42-47.
- [29] 吴佩林, 白莎莎. 清代州县书吏薪金变化及其原因[J]. 江汉论坛, 2017(7):95-101.
- [30] 李治国. 清代中后期蒙古年班制度的调整与变化[J].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2017(2):97-101.

- [31] 卢晓瑞. 晚清王笃两次“谳毁”林则徐本事考[J]. 西北大学学报, 2017(3):160-165.
- [32] 王涛. 天险变通途: 鸦片战争时期英军在中国沿海的水文调查[J]. 近代史研究, 2017(4):24-37.
- [33] 刘晨. 从密议、密函到明诏: 天京事变爆发的复杂酝酿——兼辨太平天国的盛衰分水岭问题[J]. 史林, 2017(3):77-97.
- [34] 祁磊. 咸丰十年太平军上海战役考辨[J]. 历史教学问题, 2017(5):66-71.
- [35] 庞毅. 城隍如何守城: 善城隍与晚清湖南地方政治[J]. 史林, 2017(2):92-101.
- [36] 曾志文. 咸同之际清政府的兵舰外购——以总理衙门为视角的考察[J]. 广东社会科学, 2017(2):138-147.
- [37] 周育民. 也谈“嘉定之变”与上海小刀会起义——与戴海斌先生商榷[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2017(1):145-152.
- [38] 司徒. 从《日记言行》手稿看梁发的宗教观念[J]. 近代史研究, 2017(6):122-130.
- [39] 周健. 同治初年江苏减赋新探[J]. 近代史研究, 2017(4):38-59.
- [40] 朱浒. 赈务对洋务的倾轧——“丁戊奇荒”与李鸿章之洋务事业的顿挫[J]. 近代史研究, 2017(4):60-77.
- [41] 汪荣祖. 高瞻远瞩者的寂寞: 郭嵩焘与晚清政局[J]. 史林, 2017(2):86-91.
- [42] 邱涛. 关于甲午陆战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辨析[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2017(3):44-52.
- [43] 葛业文. 甲午战争清朝失败的主要军事原因及现实启示[J]. 军事历史, 2017(5):20-24.
- [44] 马忠文. 从顾肇新家书看戊戌前后的朝局与政情[J]. 福建论坛, 2017(9):60-66.
- [45] 马忠文. 戊戌政变后至庚子事变前袁世凯的政治境遇[J]. 广东社会科学, 2017(5):107-114.
- [46] 马忠文. 翁同龢书信中的“伪札”问题[J]. 东方收藏, 2017(3):69-73.
- [47] 贾小叶. 再论湖南时务学堂之争[J]. 湖南大学学报, 2017(6):1-9.
- [48] 贾小叶. 《杭州驻防瓜尔佳氏上皇太后书》作者考析[J]. 近代史研究, 2017(6):131-138.
- [49] 贾小叶. 《新闻报》与戊戌己亥政局的变动[J]. 广东社会科学, 2017(1):126-136.
- [50] 贾小叶. 刘坤一与戊戌己亥政局[J]. 史学月刊, 2017(6):67-78.
- [51] 戴海斌. 《亚东时报》研究三题[J]. 史林, 2017(1):142-160.
- [52] 朱英. 唐论. 奕劻与庚辛议和[J]. 史学集刊, 2017(5):65-76.
- [53] 刘强, 李文儒. 浅论庚子之变后的“母子一心”[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17(3):128-137.
- [54] 韩策. 东南互保之余波: 朝臣与督抚关于辛丑乡试展期的论争[J]. 近代史研究, 2017(2):100-113.
- [55] 张海荣. 政治联姻的背后: 载沣娶妻与荣禄嫁女[J]. 近代史研究, 2017(3):46-61.
- [56] 彭剑. 1904年张謇推动清廷立宪的努力[J]. 广东社会科学, 2017(5):115-124.
- [57] 赵虎. 立宪先声: 《会议政务章程》的出台与反响[J]. 广东社会科学, 2017(1):137-147.
- [58] 康欣平. 清廷选择张荫棠查办藏事原因探微[J]. 西藏大学学报, 2017(1):46-51.
- [59] 李学通. 彰德秋操史实与影像补证[J]. 军事历史研究, 2017(2):68-73.
- [60] 安东强, 姜帆. 丁未皖案与清末政局[J]. 历史研究, 2017(4):79-94.
- [61] 马勇. 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病”诸问题[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2017(1):46-59.
- [62] 朱文亮. 清末皇族内争与袁世凯复出[J]. 历史研究, 2017(5):89-106.
- [63] 桑兵. 袁世凯《请速定大计折》与清帝退位[J]. 近代史研究, 2017(6):4-22.
- [64] 桑兵. 辛亥前十年间汉奸指称的转义与泛用[J]. 社会科学战线, 2017(1):61-79.
- [65] 李细珠. 再论“内外皆轻”权力格局与清末民初政治走向[J]. 清史研究, 2017(2):9-23.
- [66] 李学峰. 载沣与清末海军的“兴复”[J]. 史学月刊, 2017(7):65-74.
- [67] 马平安. 关于清末海军重建的一点看法[J]. 马文艳. 海上国门——大沽口炮台研究文集[M]. 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7:35-45.
- [68] 郭卫东. 论晚清时代的地方外交[J]. 广东社会科学, 2017(4):102-110.
- [69] 张建斌. 光绪朝长沙开埠与英商入城交涉始末[J]. 历史档案, 2017(1):105-111.
- [70] 赵欣. 再议英国与对华“门户开放政策”[J]. 史学集刊, 2017(1):59-68.
- [71] 戴东阳. 高桥作卫与百年来高升号事件研究[J]. 北京社会科学, 2017(10):27-36.
- [72] 李花子. 试析1907—1909年日本界定的“间岛”地理

- 范围[J]. 近代史研究, 2017(3):148-159.
- [73] 张振鵬. 福祿诺节略与中法战争两个阶段的转变——从《泰晤士报》的一篇报道说起[J]. 近代史研究, 2017(4):146-152.
- [74] 葛夫平. 第二次四明公所案与上海法租界的扩界[J]. 历史研究, 2017(1):68-84.
- [75] 张礼恒. 清朝驻日使领与朝鲜“朝士视察团”[J]. 近代史研究, 2017(6):88-104.
- [76] 张礼恒. 近代中朝关系的现代性转换——论李鸿章的“不沾不脱”原则[J]. 清华大学学报, 2017(2):97-104.
- [77] 尤淑君. 朴定阳违制事件与朝鲜的自主诉求[J]. 史林, 2017(2):102-112.
- [78] 陈开科. 1891年俄国皇太子东游旅华述论[J]. 社会科学研究, 2017(5):172-182.
- [79] 张志勇. 赫德与早期中葡通商通航条约谈判[J]. 国际汉学, 2017(2):132-138.
- [80] 王宏斌. 从蕃坊到租界:试探中国近代外侨政策之历史渊源[J]. 史学月刊, 2017(5):75-84.
- [81] 徐春峰, 屈春海. 清末驻巴拿马总领事馆的设立[J]. 历史档案, 2017(1):112-118.
- [82] “清光绪帝死因研究”课题组编. 清光绪帝死因鉴证[M]. 北京:北京出版社, 2017.
- [83] 韩策. 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 [84] 马平安. 慈禧与晚清六十年[M]. 北京:新世纪出版社, 2017.
- [85] 崔志海, 任智勇, 顾建娣, 张海荣. 2014年晚清政治史研究综述[J]. 近代史学刊, 2016(1):274-284.
- [86] 崔志海, 顾建娣. 2015年晚清政治史研究综述[J]. (未刊稿).
- [87] 张建. 2016年晚清政治史研究综述[J]. (未刊稿).
- [88] 朱泚. 晚清史研究的“深翻”[J]. 史学月刊, 2017(8):11-15.

(责任编辑:何 艳)

A Review of the Studies in 2017 on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Late Qing Period

QIU Zhi-hong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6,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Late Qing period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branch of the subject of political history in modern China, but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history of Qing Dynasty in broad sense. In 2017, with the help of the “golden ag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history of Qing Dynasty, China domestic historians, by using the method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made more meticulous and deep study on the institutional history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historical events and figur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from many perspectives. Among them, the institutional history and the event histor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remained the focus of the political history stud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overall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Late Qing still maintains vigorous vitality and vigorous in the mature and steady discipline development.

Key words: the Late Qing Dynasty;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institutional history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Review